

張西平序

從基督教思想史來看，「索隱解釋」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早期時《聖經》解釋的基本特點和方法。對《聖經》舊約的解釋是「索隱思想」的起源。在歐洲對《聖經》的解釋中，如何處理《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關係，是當時基督教面臨的重大問題，這樣就產生了《舊約》索隱派的理論，他們從《舊約》中尋找《新約》的形象和真諦。最初的基督徒都是猶太人，對他們來說沒有必要將希伯來信仰的《舊約》和他們對基督的信仰《聖經》做出太嚴格的區分。但當基督教向猶太以外的地區傳播時，就會面臨如何向外邦人解釋和說明猶太信仰的希伯來聖經和基督信仰之間的關係。最早提出這個問題的，是在公元2世紀時「一位名為馬西昂 (Marcion) 的基督徒提出了新、舊約的關係問題。他看到使徒們在立場上有曖昧的地方，同時也注意到《舊約》給基督徒帶來的問題。」¹究竟是哪些問題呢？首先是上帝的形象，在《新約》裏，耶穌所說的上帝是仁慈的，而《舊約》裏的上帝有時是極端野蠻、殘忍的；《舊約》是以色列人的信仰，《新約》是基督徒的信仰，這種差別也是明顯的；「耶穌本人宣稱，他來到世上是為要『成全』希伯來聖經（馬太福音 5.17），但他在行動上卻似乎拋棄了其中某些最有特色的教導，不僅是在守安息日（馬可福音 2.23-28）和飲食律例（馬可福音 7.14-23）這類問題上，在某些道德教訓上也是如此（馬可福音 7.21-45）。」²這樣《舊約》和《新約》的關係問題就擺在基督徒面前。

1 (英) 約翰·德雷恩 (John Deane) 著；許一新譯：《舊約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377。

2 約翰·德雷恩著；許一新譯：《舊約概論》，頁376。

採取一種索隱的方法，將《舊約》和《新約》連接起來，這就產生了《聖經》解釋的索隱派，因為從神學上說《舊約》是《新約》的基礎，如果沒有《舊約》，基督教就沒有了上帝和自然關係這樣的視角，就沒有了《新約》全部解釋的基礎，如果忽略《舊約》，《新約》自身很難自圓其說。這樣，確立堅信只有一個上帝，他是宇宙全能的主宰，也關愛著所有人，這是《舊約》和《新約》的最根本共同點；在解釋耶穌基督與人類的關係時，其神學框架也必須建立在《舊約》創世故事中的上帝與人類的關係論述之上。

如何實行這些最基本的神學原則呢？那就需要採取索隱的方法，將《舊約》中並未顯現的道理解釋出來，通過這種象徵性解釋，使《舊約》和《新約》成為一個邏輯上緊密連接的整體。

索隱作為對《聖經》的解釋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字面的解經，另一種是超出字面的解經。

我們先看第一種字面解經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依據文本，從語言上對《舊約》或《新約》的書面文字內容進行解釋，闡發其宗教意義。《聖經》並不是由一位作者所完成的，而是有許多作者，在不同的時期，有著不同的原因，按照不同的書寫風格，在長達千年的時間中形成的。這樣的記述會有前後矛盾和不一致之處。面對信徒的質疑，必須從文字上對經書進行整理，按照語言固有的規律和特點加以研究。這種釋經的方法就是後來西方語文學的根源。語文學(Philology)就是通過對文獻文字的語言學研究「確立由傳統流傳下來的本文，並重新實現本文的意義」。³在我看來，儘管這種解經的方式是依據文本和語言來說明和揭示文本的意義的，這裏同樣包含了一種索隱思想，因為思想的解釋和文本之間並非完全一致，這是需要靠解釋者來加以說明的。當然，相對於超出字面的索隱方法，我們可以將這種字面解經的方面稱為「具象性索隱法」，即這種文本意義的闡發，必須是根據文本的文字——這一具象來完成的，意義的產生不能完全脫離文本。

第二種是超出字面的解經方法。所謂超出文本，就是說從文本中無法獲得一種意義，從字面上，無法展現出更為深刻的思想，文本的意義和思想必須超出文本來加以說明和闡釋。如果把基於文字解釋的方法，即「具

3 潘德榮：《詮釋學導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18。

象索隱法」作為索隱方法的初級階段的話，那麼，這種脫離文字的解釋方法，即「抽象索隱法」，我們可以稱之為索隱方法的高級階段。

這兩種《聖經》的解經方法和傳統成為西方宗教與人文學術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和背景，深刻地影響了以白晉為代表的法國來華傳教士。

白晉研究《易經》起源於禮儀之爭，作為耶穌會士，他要捍衛利瑪竇留下的遺產，他要回擊以道明會所代表的托鉢修會對耶穌會傳教路線的批評，說明利瑪竇路線的合理性和正確性。隨著德國教會史研究專家柯蘭霓的《耶穌會士白晉的生平與著作》⁴、美國漢學家魏若望的《耶穌會士傅聖澤神甫：索隱派思想在中國及歐洲》⁵、丹麥漢學家龍伯格的《清代來華傳教士馬若瑟研究》⁶這三本譯著的出版，以白晉為首的索隱派團體的整體情況開始為中國學術界所知。

黎子鵬教授是中文學術界最早展開白晉索隱思想研究的人，他在《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一書中，便通過對白晉《易經》解釋的研究，指出白晉試圖從歷史的角度把《易經》納入救恩史的敘事脈絡，並從對《易經》相關經文的講疏內容，推演出六千年救贖史和耶穌生平史兩個敘事結構。他認為白晉的詮釋一方面缺乏易學傳統理論的支持，另一方面亦使《易經》失去了主體性，淪為《聖經》救贖敘事的載體。

長期以來學術界集中在來華傳教士的索隱派思想研究，但傳教士的這種研究在中國本土是否產生了影響？中國本土教會對傳教士的索隱理論有何反映？這是學術界長期沒有注意到的問題。子鵬這本書首次整理了中國本土教徒呂立本的《易經本旨》，讓我們看到索隱的釋經理論在中國本土的反映。呂立本是否看過白晉等人的手稿，是否讀過白晉的《天學本義》，這些問題雖然尚未找到直接的證明，但呂立本的價值在於「透過重現這份本土文本的獨特面貌，顛覆過往視索隱易學為『外來』產物的刻板印象，試圖為相關的研究開闢另一種想像和閱讀的可能」。

4 Claudia von Collani, *Die Fihuristen in der China mission*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1981).

5 John W. Witek, *Controversial Idea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A Biography of Jean-François Fouquet, S.J. (1665–1741)* (Roma: Institutum Historicum S.I., 1982).

6 Knud Lundbæk, *Joseph de Prémare (1666–1736) S. J.: Chinese Philology and Figurism* (Aarhus C, Denmark: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1991).

子鵬的研究使我們看到，呂立本的索隱思想在吸收艾儒略等來華傳教士的一些神學思想以外，主要是從中國本身的思想文化資源來加以解釋。《易經》作為最古老的漢語文獻之一，見證著中華文明的發展軌迹，歷來為各種思想與宗教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儒家有「傳」，道家有《周易參同契》，而且民間宗教等也與《易經》有著緊密的連繫。《易經》解釋的這種開放和多樣性為中國各類宗教思想提供了基礎。呂立本不僅打破了傳教士「獨尊儒術」以及「上層路綫」策略的局限，更充分利用這些本土宗教的元素豐富天主教信仰的內涵。所以呂立本立足《易經》來闡發自己的神學思想就與白晉立足《易經》的闡發有所不同。當白晉解釋《易經》的思想資源主要源於西方，而呂立本解釋《易經》時則主要源於中國的思想資源。如子鵬在書中所說「自東漢魏伯陽(151-211)著《周易參同契》起，便開啓了道學託易象而論煉丹的傳統。魏氏主『天人合一』說，認為煉丹修道與宇宙生化同理，人若能掌握天地陰陽之機，便可煉藥提升和轉化身體和意識，達至長生不老的成仙境界。他把易理卦象具體運用在還丹燒煉的說明上，以乾 ☰ 坤 ☷ 為器(鼎爐)，坎 ☵ 離 ☲ 為藥(汞鉛)，五行為輔助，解說火候調運、和合鉛汞結成金丹的原理。……呂立本巧妙地借用內丹成仙論(immortalization)的系統來表述天主教成聖論(divinization)，以『修行得道』、『長生不老』等既有觀念去框定『修德得救』、『永生不朽』等概念，並立聖子耶穌和聖母瑪利亞為表率……但他援引《歷代神仙通鑑》的作法生動反映了本土人士對瑪利亞神學形象的理解和想像，亦揭示了禁教時期天主教與民間宗教錯綜複雜的關係。」這樣的例證在書中還有很多，從而使我們看到中國本土神學思想的創造性。

子鵬熟悉白晉的索隱理論，使他能對來華耶穌會士的索隱神學和呂立本的索隱神學加以對比，從而使我們有一個更為寬闊的學術視野，對索隱理論在中國發展的多維性和複雜性有新的認識。他的結論是：「由此看來，呂立本釋象手法與索隱派傳教士確有不少相似之處。然而相較於傳教士抽取零星卦象加以演繹的作法，呂立本借宋易象數學所建立的八卦象徵系統更顯完整，而他的義理論述亦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

近期我主編的《白晉文集》將陸續出版，其中整理了梵蒂岡圖書館收藏的近30萬字的白晉《易經》研究手稿和《天學本義》的多個文本；而我的白

晉研究專著也將在明年出版。現在讀到子鵬的書稿，十分感興趣。與學術同行切磋學問，探求新知實乃滋養學問之妙法。是為序。

張西平

北京語言大學特聘教授

2023年8月20日寫於巴黎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賴貴三序

——易宗神化天人道，經貴會通聖哲心

筆者於2017至2018年在魯汶大學漢學系研究學習時，曾經在該校中央圖書館二樓「東方圖書館」閱覽及複印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杜鼎克(Adrian Dudink)、王仁芳共同整理編輯之《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一、二冊，以其中收錄的乾隆中葉呂立本撰註之《易經本旨》為研究原典，考論十八世紀後期中國教友天主教式的《易經》闡釋，從西方《聖經》學的傳教士觀點，以及中國學者對於《易經》交流互涉、調適融格的思想脈絡，作為中土《易經》學與西方《聖經》學在詮釋研究上「視域融合」的觀照參考。

《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與之前出版的明清天主教文獻相同，刊行的多是尚未出版過、或不為外界所知的文獻。這些大多由中國與歐洲教士共同寫就的手稿或印本，重現了十七世紀以來的中歐交往樣貌。黎子鵬、胡獻皿《耶易會通：清代天主教徒呂立本〈易經本旨〉研究與編注》係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第一、二冊收錄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歲次甲午季夏河東晉邑呂立本撰註」、同治十一年(1872)「壬申歲清和月中浣雲間方濟各謹錄」之四卷楷書過錄稿本《易經本旨》為主要研究編注文本，合共四卷計792頁，卷帙內容甚為完整豐富，全書以天主教《聖經》教義本旨，詮釋《易經》六十四卦，別開生面，自成體系，迥異於傳統以儒、道、釋為解者，從來所未見，也一直未為學者所關注，至今罕見相關研究成果，深具學術探討價值。

本書釋文校注付梓出版，以供學界比較參考、觀覽對照，先以導論總括全稿，檢證作者如何援引天主教義，作為詮釋《易經》思想脈絡體系的藍本，並試圖從宗教性、學術性、時代性三方面，分判與會通兩者的同異、

混通與和合，藉此觀察並體會西方天主聖義如何與東土儒學《易》教的調適與融格，辨章考鏡，精當中肯，為學者開啟一扇《易》學研究的明窗。《易經本旨》全書共分四卷，值得注意的是，卷三到卷四之間，缺少了由〈坎〉卦到〈艮〉卦共二十四個卦，筆者推測造成缺漏之可能原因有二：一為自然佚失，被收入《徐家匯藏書樓明清天主教文獻續編》前便在流傳過程中散佚；二為抄錄時遺漏，因此書各卷之抄錄者不同，且各卷被抄錄時間與成書相隔約一百年，極有可能於抄錄過程中出錯或遺漏。

本書作者呂立本以比喻手法發掘出《易經》的「原始含義」，並融入天主教思想、故事與符號，營造出獨特的「耶穌受難敘事」(passion narratives)風格。而天人關係是探討天與人互動模式的課題，其中之「天人合一」被視為是中國哲學的中心觀念。《易經》之天人思想隨著時間推移而有所不同，簡而言之可依畫卦出現、六十四卦產生到十翼作成，分為自然思想、神道思想與人道思想，其間共同的特色則是中道和諧。而《易經本旨》的天人關係因加入天主教思想，而產生截然不同的面貌。

中國先賢皆為主動的創造《易經》，不論取法天地、重卦、作十翼，皆出於人為。而《易經本旨》在此強化了「天」的地位，例如呂立本認為卦畫「本自上主默啟伏羲所畫，而為文字之祖」。而重卦與繫辭是「上主默啟文王所繫，爻象係周公所作，繫辭乃孔子所言。」呂立本認為中國先賢創造《易經》是受神明啟發，此處先賢的主動創造轉變成受託創造，主動性依然存在，但更強調「受託、受啟發」的部分。而託付創造《易經》之神，呂立本稱其為「上主」，即天主教中的「天主」。呂立本認為《易經》由天主所創，是天主給予人們判別是非善惡的工具，亦是天主獎賞或懲戒人的依據。《易經本旨》中的「天」，是萬物的主宰、善惡的制定者，亦是賞罰世人的裁決者；相對的，人是受天主支配、保護、引導的存在。

人雖有罪但天主並未棄之不顧，而是派遣自己的兒子降生於世、引導世人改過向善，若能誠心悔改則能化解災禍，最終前往天國；反之則去到地獄，永遠承受痛苦與悔恨。人在《易經本旨》中的角色至此明晰，人是生來即有罪的、是受「天」支配的，亦是受「天」愛護的對象，理應對天懷著敬畏之心。另外，書中出現的「聖子」，即天主教中的「耶穌」，是《易經本旨》中溝通「天」與「人」的特別存在。他既屬於神亦屬於人，是傳達神的意旨、

引導世人行善者，卻與中國所謂的「聖賢」有所區別，因他只有一人，聖賢應排在他之下。

綜上所述，《易經本旨》中的天人關係中大致有四種角色，由上到下分別是：「天主」、「聖子」、「聖賢」、「世人」。「天主」是自然也是神，創造、支配、賞罰、愛護著祂之下的萬物；「聖子」是次於「天主」的存在，引導萬物順從天道即是他的使命；「聖賢」則是所有助「世人」覺醒、向善的推手；最末位是「世人」，他們背負原罪，受天支配、受聖子引導、受聖賢啟蒙。在此環境中塑造的天人關係，可說是極為複雜，但大體上是和諧的狀態。

再者，《易經本旨》中〈巽〉卦與〈離〉卦，分別被賦予「聖母」與「聖子」的形象，其成因除了呂立本重視卦象圖外，亦能從中看到天主教中取象連結而來的元素。此轉化過程亦能更清晰的觀察到，呂立本對《易經》的新創手法是將天主教符號以相似的概念融入，在賦予《易經》新意涵時，亦同時使讀者默默接受了他所欲傳達的天主教內容。

呂立本認為《易經》中奇妙的陰陽變化皆為天主所創，是提供世人判別是非善惡的標準，亦是人死後天主用來決斷要上天國或下地獄的依據。然而「今之迷子不知生從何來，死歸何去，而不求知，其為愚也，至矣！至矣！」多數中國人並不熟悉天主教教義，身為天主信徒的呂立本對此充滿激憤與悲嘆，是以他注解《易經》，認為它是傳揚天主教教義的聖經，亦是天主提供中國人「養靈魂大體之真道」，不信者必遭凶禍，並永受無窮之苦。

呂立本將中國經典轉化為天主聖經的手法，可能是受到「索隱派」(Figurists)的影響，嘗試以八卦本意與天主教典故融合，例如〈兌〉二以〈兌〉之「說話」結合聖子「二性」而成；〈震〉四以「雷」結合天主之「怒降洪水」而成。呂立本大量運用這些類比手法，將中國人熟悉的經典轉化為天主教聖經。筆者以此推測，《易經本旨》可能是呂立本為了在禁教時期傳教而作。透過中國經典包裝天主思想再散播於民間，除了能使中國人對其說的接受度提高，且以書籍流行而不進行集會，亦能減少遭逮捕的可能。要之，《易經本旨》透過中國經典闡揚天主教的教義思想，其行文風格受索隱派的影響，多以類比手法進行注解，引進大量天主教典故之餘，亦賦予《易》新的面貌。而其文字多急切、激揚之調，與清朝禁教、傳教不易且危險性十足之歷史背景相關。

《易經本旨》豐富的天主思想與《易》原本即有之神妙相融，形成富有宗教意義的作品。本書探討其天人關係——天主、聖子、聖賢、世人，並聚焦於「異女生離王」之論點，並分別被賦予「聖母」與「聖子」的形象，因此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將《易經本旨》分類於「真教辯護類」，可見它運用天主教思想注《易經》之舉，含有捍衛天主教原典之宗教意義。

呂立本以天主教經典《聖經》本位的角度出發，在《易經本旨》中對於卦旨的闡釋著重關注天地中所包含的天人關係，而不涉及探討純粹物理性的事物。其對《易經》的解讀有意附會天主教的思想，某種程度上也體現出他對《易》學與《聖經》觀點相近處的把握。可見《易經》與《聖經》共同擁有以天地相交而通泰的理想，並且為了實踐天地交融的理想，皆採取包容、不結黨營私、屈尊降卑的態度；藉著《易經本旨》的天主教化的解讀，透顯《易經》與《聖經》在以天地表徵的上下關係思想上的趨近。

《易經本旨》於中西文化衝擊、融合中產生，是清朝統治時期的天主信徒所作，其豐富的天主思想與《易》原本即有之神妙相融，形成富有宗教意義的作品。非常慶幸黎子鵬、胡獻皿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完成《耶易會通：清代天主教徒呂立本〈易經本旨〉研究與編注》一書，對於《易》學研究者與天主教友，當有「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的啟發影響，樂讀、悅究之餘，且拭目以待——洛陽紙貴，嚶鳴友聲。

賴貴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2023年11月3日於屯仁學易廸進齋

李爽學序

明末西學東漸，天主教耶穌會士管領風騷，多數的歷史學家都以為他們的貢獻僅限於科技曆算，沒料到他們也解釋中國古典，而且不做則已，一做就是春秋墳典，《易經》尤受重視。歷史走到清初，一群由法國來華的耶穌會士，對《易經》的認識更加與眾不同。這群會士以白晉為首，但馬若瑟等人就《易經》所做的疏論後來居上，早已經打響耶穌會索隱派的名頭。蔡元培等《紅樓夢》索隱派，喜歡在小說中尋找清宮遺緒，耶穌會索隱派呢？他們愛好在《詩經》、《易經》或《書經》中窺覓天主奧義。如前所述，《易經》乃他們檢索的首要經籍。但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就在索隱派內有羅馬教會掣肘，外有中國官方查禁之際，地下教徒呂立本居然在乾隆年間也走上了索隱派的老路，成為首位以索隱派的手法重詮《易經》的中國信徒。

呂立本何許人也，我想知者乏人；250年後，他在香港總算覓得知音。黎子鵬教授和胡獻皿女士眼明手快，搶先告訴我們問題的初步答案。呂立本乃山西太原人，是受洗的天主教徒，所著《易經本旨》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成書，認為《易經》所載都是天主奧義，到處洋溢著天學弦音，是以特撰此書，將他讀《易》的心得公諸世人。寬鬆一點來講，明代來華的利瑪竇可稱耶穌會第一位索隱家，《天主實義》等名著，無不在中國古經中找尋天主遺蹟，把東西宗教串連為一。其後金尼閣等人賡續索隱，認定先秦古籍中的上帝就是天主教的陡斯。白晉、馬若瑟和傅聖澤等人是清代最著名的索隱家，大多在古經中探訪天主教義，進一步書之成文，筆之成書，貢獻卓著。呂立本身為中國士子，對《易經》有充分了解，探討更為詳盡。《易經本旨》雖為殘稿，卻系統儼然，有秩有序，乃華人索隱派的開路先鋒。

胡獻皿女士勤於撰述，是黎子鵬教授的入室女弟，而子鵬又是我多年好友，我所知較多。他精於基督教的文字事業，著有《福音演義：晚清漢語基督教小說的書寫》、*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等中英要籍多種。幾年前他把觸角伸向天主教的著作，編注了《清初耶穌會士白晉〈易經〉殘稿選注》，又拉高觸角，關注到呂立本這本《易經本旨》，實屬不易。就我所知，子鵬關心呂著已有多多年，他為此從香港到上海，又從上海回到母校牛津大學，矻矻專心，孜孜不倦，多方查考，廣事研究，終於為呂立本箋注了《易經本旨》。衡諸東西學界，索隱派的《易》學大要，再也沒有人做得比子鵬及其高弟胡獻皿女士來得精當的了。

我雖寫過《馬若瑟的文學世界》一書，嘗就《詩經》談點索隱學，然而對《易經》，所知反而有限，是以這篇文章只宜短，不宜長，否則就濫竽充數，越俎代庖了。是為序。

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2023年9月18日寫於臺灣南港

鄭吉雄序

《易經》因其宗教性、神祕性和多元喻象方法，在歷史長河中，較《詩》、《書》諸經流傳更廣，終而成為全球經典。邁入二十一世紀後，得力於全球化浪潮與資訊科技精進，《易》學傳播更為順暢，東亞各國迺至東西方交流日益頻繁。筆者近年致力與國際學界攜手推動「寰宇《易經》」(Global Yijing) 研究項目，正是感知《易經》全球化的好機遇，也是筆者邁向退休路上的好運氣。而今有幸奉讀黎子鵬教授及其高弟胡獻皿合撰《耶易會通：清代天主教徒呂立本〈易經本旨〉研究與編注》一書，內心鼓舞不言而喻。

《易》道廣大，研究途徑多方。本經的研究，當先立足訓詁、校勘，進路則兼取義理、象數、圖象；惟一旦擴大到歷史宗教比較研究，則軌轍迥異，必須以跨文化、跨領域精神推擴新義理，絕不能株守本義。呂立本《易經本旨》的價值正在於後者。由於《本旨》殘佚嚴重，版本多歧，目前學界尚欠缺一較全面而具有深度的校注，引導讀者認識文本。本書付梓，透過校注《本旨》殘稿，而以東西方聖典義理的融通為聚焦，無疑為學界提供一重要研究材料，不但裨益於寰宇《易經》研究，也昭示了跨文化、跨領域的重要性。《本旨》一書，雖為中土文士以中文撰著，鑒於其中融貫耶教教義，要掌握其義理，必須通解泰西語文，並對歐陸宗教歷史有深入了解。子鵬教授留學英倫，專研翻譯與宗教，嫻熟中西語文，久治理雅各 (James Legge)、麥麗芝 (Thomas McClatchie) 等傳教士文獻，深悉耶穌會士索隱派《易》學底蘊。有此學殖，探研耶《易》學說交融，其分析深入而獲豐碩成果，實順理成章，及時為此一領域補入重要板塊，貢獻不可謂不大。尤有進者，因呂立本以耶教教義與《易經》經義作雙向解釋，好比用兩種不同

顏色的射燈交互照耀，產生了眾色紛陳的奇幻效果。讀者因而可見呂氏以八卦喻象比附《聖經》教義及故事，或以「三才」引喻「聖三」(Trinity)，或將Holy Family納入，綰合「父子母神」為「陰陽四聖」論，其中涉及聖母地位在耶教學說於中土傳播中的歧解異義。至於比附耶教教義時，或引入以《易》理為核心的道教內丹學說，或與《歷代神仙通鑑》「佛祖傳燈」等涉及中國化之佛教教義相格。透過本書，讀者可一覩由《聖經》與《易經》互詮，進一步擴大為宗教交互影響的文化傳播現象。凡斯種種，皆可見此書的特色與貢獻所在。

筆者自2000年起在國立臺灣大學推動東亞文化文明的跨領域研究，除鑽研《易經》詮釋傳統，亦推廣《易》學國際化，有幸得與歐、美、日、韓與海峽兩岸三地的《易》家交流，深知《易經》全球化足跡溯源尋流的箇中艱苦。任何點滴研究成果，都能沾溉《易》學土壤，讓故土孕育出新苗。本書刊佈，對東西方宗教文化研究產生深遠影響，實可預期。今付梓之際，承作者雅囑撰〈序〉，謹揭示《易》學全球傳播旨趣數端，以敬告天下後世《易》學同好如上。

鄭吉雄

香港教育大學文化歷史講座教授

2023年9月8日癸卯年白露書於御龍山寓廬

韓子奇序

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海內外的易學研究一直蓬勃發展。在國內，隨著地下文物的出土（例如馬王堆帛書、王家台秦簡、清華簡、上博簡），學者對《周易》古經經文的編撰及早期版本的流變，有了更為深廣的認識。在國外，因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化，外國學者對中國易學傳統的發展（例如王弼的「哲學易」和程朱的「理學易」），產生了濃厚興趣。四十年來，經國內外學者不斷努力，易學已經成為全球學術研究的熱點之一。從地域來說，易學範圍不單覆蓋東亞、東南亞諸國，也包括歐洲、英國、北美等地。誠如美國易學家司馬富（Richard J. Smith）所說，《易經》已成為跨文化、跨種族、跨國界的全球性經典；它雖源自中國，但面向世界，以不同方式給面臨危機、困惑和恐懼的人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

截至目前，研究全球易學主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是通過外文翻譯去了解《易經》如何從中國國內傳往世界各地，讓外國讀者讀通讀懂《易經》。另一方面是研究當《易經》傳至國外後，它如何落地生根，融入外國的文化環境，在新的文化土壤裏開花結果。這兩種研究方向的優點是各行其善，一邊集中研究易學怎樣從內循環轉為外循環，另一邊則集中研究易學怎樣從外循環轉為內循環。但它們的優點同時也是它們的弱點。兩種研究方向總是河水不犯井水，好像內外循環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更遑論突顯內外兼備、四通八達、川流不息的全球易學循環。

從全球易學研究的發展來說，《耶易會通：清代天主教徒呂立本〈易經本旨〉研究與編注》的面世是一個重要突破。兩位編著者的貢獻，不止是把

呂立本《易經本旨》殘本整理出版，為研究清代天主教傳教史的學者提供了一份珍貴資料。更重要的，是兩位編著者從分析《易經本旨》的成書過程與書中內容，證明易學的內外循環之間，其實還有第三個循環。這第三循環介乎內外循環之間，既不完全屬於任何一方，又能貫通兩方。

在一般中外文化交流的著作裏，這種第三循環往往被忽略，原因是它若明若暗，若顯若隱。正如兩位編著者在〈導論〉所說，《易經本旨》是利用《易經》去解釋天主教的教義，目的是把《易經》變為《聖經》。但《易經本旨》出現的時代，卻是乾隆禁教之後，在沒有傳教士的指導和保護之下，中國信徒為了繼續維持宗教信仰，把《聖經》變為《易經》。故此，《易經本旨》是一個兩不像的東西。它既是《易經》又不完全是《易經》；它既是《聖經》又不完全是《聖經》。

從內容來說，《易經本旨》是易學著作。它解釋《易經》的六十四卦，在解釋卦爻時，呂立本刻意地利用來知德的錯綜方法去解釋卦爻辭，因此它是一種典型的象數易學作品。但從思想層面來說，呂立本的《易經》其實是《聖經》。呂立本的《易經》比附《聖經》，其背後的理論基礎是明代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的「索隱派」傳釋法，目的是把所有中國古代經典都變為《聖經》的隱喻。因此在《易經本旨》裏，八卦六十四卦並不是占筮的記錄，而是突顯從創世到末世的救贖過程。但同時，《易經本旨》又不完全是耶穌會「索隱派」的翻版。在闡釋《易經》的過程中，呂立本加入不少中國的本土元素，例如山西人對女神的崇拜和對道教煉丹的尊崇。在一定程度上，《易經本旨》反映了中國北方的地方信仰，是天主教在地化的具體表現。

目前，《易經本旨》是我們找到唯一內外兼備的易學文本。但從閱讀這個文本，我們至少可以提出以下兩個問題。一，康熙禁教後，中華大地上依然有不少教徒繼續信奉天主教，而且開始在地化，把天主教義與中國地方宗教混合一體。在這個大環境下，義理易學與《聖經》的對話，究竟擦出了什麼樣的火花？二，這天主教在地化的發展，是否與日後《易經》再一次外循環有關？即是說，《易經本旨》這類書有沒有影響到1840年後新教傳教士的《易經》翻譯？

當然，上述兩個問題需要更多文獻證據才能作答。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發現更多、更完整的內外兼備的易學文本，使全球易學研究更為充實充分、更加多姿多彩。

韓子奇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歷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2023年9月11日寫於珠海海怡灣畔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自序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對天主教索隱派易學興趣日濃，成果漸豐。筆者早前經多年的研究，於2020年出版了索隱派代表人物耶穌會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手稿的編著，旨在為相關的討論提供新的視角和素材。而在此過程中，有幸涉獵《易經本旨》這部彌足珍貴的作品，為我們的研究另闢蹊徑。

有別於大部分耶穌會西教士的著作，《易經本旨》乃清代華人信徒呂立本主動書寫的索隱易著，具體展現了本土的信仰群體如何接收、理解和傳遞索隱派傳教士的觀點，促成《易經》與《聖經》較深入的對話，使兩套價值體系交相激盪。這部索隱易學的遺珠亦標誌著清初天主教禁教期間耶穌會撤退後，本土的信仰群體為保教所作出的努力，其獨特性和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然而，《易經本旨》具兩大缺失，令不少研究者卻步。首先，這部作品只剩數份殘稿，至今未能確證其曾出版流傳。此外，作者身份背景不明，除了名字和籍貫，學界對其一無所知。這種模糊性為確立文本的歷史定位和價值帶來難題。不過，這些挑戰驅使我們以更嚴謹細緻的目光來解讀該文本，從中挖掘更多珍貴的歷史信息和宗教文化內涵。無論從易學或神學傳統的角度來看，呂立本的書寫皆「非主流」，甚至有違「正統」(orthodoxy)。這卻正是其魅力與價值所在。《易經本旨》讓我們脫離以往主流研究以宗教建制及精英主導的進路，回歸底層的視角，深入窺視一位華人信徒真實的宗教處境與心靈經驗。呂立本不僅是歷史個體，更是一個符號，象徵著每一位未在史上留名、身份模糊的信徒。儘管他們的面貌和聲音往往在歷史宏大的敘事中被省略，卻是天主教得以在中華大地扎根開花的重要推動者。本書不僅是對索隱易學研究課題的延伸，更是對這些被遺忘個體的追溯和紀念。

本書除了於〈導論〉深入分析其內容結構及詮釋策略外，現把《易經本旨》各手稿重新整理點校出版，配以嚴謹而詳盡的腳注。在編寫注釋方面，筆者特別關注《易經本旨》與天主教神學著作和中國傳統經籍的互文關係，以呈現呂立本如何精心揉合天主教與本土宗教文化遺產的資源，促成「耶易會通」的跨文本對話。《易經本旨》不僅是天主教本色化 (indigenization) 的典範，其中呈現多元開放的宗教觀，對當代漢語神學以及宗教對話亦提供了極具價值的參考。為了凸顯該文本的特色，本書的封面設計精選了多幅富中式風格的基督宗教海報。這些繪圖巧妙地揉合了天主教符號及本土文化元素，有助呈現《易經本旨》的獨特宗教價值和深刻文化內涵。

本書的出版得益於多方慷慨相助。首先，有賴上海圖書館徐家匯藏書樓負責人徐錦華博士多年來提供支援，使本書順利蒐集這批皮藏於該館的手稿，謹向徐博士深表謝意。此外，衷心感激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編輯葉敏磊博士及張煒軒先生，在出版計劃、排版及校對等方面提供了專業的意見。另外，承蒙張西平、賴貴三、李爽學、鄭吉雄，以及韓子奇教授撥冗惠賜序文，與有榮焉。最後，要感謝多位研究助理的辛勞工作，包括黃愉行、陳皓婷、鍾卓言、韓樂憫、胡碧文、李蔚婷、陳曉童、王文謙、鄭羽彤和羅曉婷。他們的貢獻令筆者銘感於心。

封面選用的海報分別藏於聖言會通用檔案館 (General Archives of the Societas Verbi Divini / Divine Word Missionaries Collection) 及 Société des Auxiliaires des Missions Collection，感謝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與 Whitworth University 提供並允准使用該些海報的圖像，同時鳴謝波士頓大學 (Boston University) 「全球基督教與宣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Global Christianity and Mission) 「基督徒海報項目」 (Chinese Christian Posters Project) 的協助。

最後，本書的研究及文獻蒐集承蒙香港研究資助局 (Research Grants Council of Hong Kong)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傑出學者計劃」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restigious Fellowship Scheme) 對「The Global *Yijing*: The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and Transnational Reception of the *Yijing* (Book of Changes) in Western Religion and Literature」研究項目 (項目編號：CUHK 34000223) 的資助，並獲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出版補助金 (Publication Support Fund) 資助出版，謹致謝忱。

黎子鵬、胡獻皿

2024年2月28日

香港中文大學